

# 父亲心中的“第一位置”

■刘京生

## 家人

自1926年父亲参加革命算起,到现在已过去100年了。每每回忆父亲对我说过的话,和他历经苦难且无私奉献的人生历程,都让我感慨万千。

我的父亲名叫刘显宜,1903年9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县散山庙乡芭蕉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由于生活所迫,父亲小小年纪就到附近的煤场外和大户人家倒掉的渣堆里捡煤渣,攒多了再拿出去卖。从十几岁起,他就给地主家当短工、抬轿子,挑起了家里的生活重担。

1926年湘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。父亲组织散山庙附近一些村的年青人成立了农民赤卫队。他被选为农民协会的副会长,兼任散山庙乡农民赤卫队队长,开始了对抗反动派的武装斗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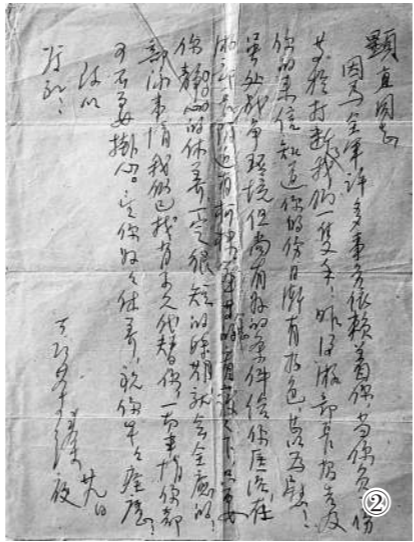
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,国民党反动派联合地主“挨户团”疯狂清乡,逮捕农民协会会员,父亲是敌人追捕的重点对象之一。为了避开反动派清乡,父亲和其他同志扛着梭镖走进深山躲了大半年。第二年年初,一支不足百人的工农革命军队伍来到了散山庙,与农民协会的领导和赤卫队会合。那天一早,赤卫队配合工农革命军,仅一个多小时就消灭了尾随而来的约400个敌人,缴获大量武器。父亲领到了一支“汉阳造”,毅然决定参加工农革命军。

跟随队伍到达井冈山后,工农革命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。父亲被分配到第28团新组建的迫击炮连当战士。

8月的一天,红军主力下山转战,担任迫击炮连司务长的父亲留下来修理迫击炮。当时红军在黄洋界哨口只有2个连的兵力,4个团的敌军趁虚而入,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。正当红军弹药不足,情况万分紧急之时,父亲接到指挥战斗的第31团副团长兼第1营营长陈毅安通知,和几名战友扛着刚修好的迫击炮,还直接命中敌人的指挥所,引起连续爆炸。山上的红军和乡亲们跟着炮声摇旗呐喊,一时间鼓号齐鸣。敌人听出这是钢炮的声音,误以为是红军主力回来了,立刻全线溃退。后来,毛泽东同志用“黄洋界上炮声隆,报道敌军宵遁”的词句描述了这次战斗。当



图①:1937年聂荣臻(前一)率领军区机关由山西西台向河北阜平进发,前三为刘显宜;图②:1941年聂荣臻致刘显宜的亲笔信。



时参加战斗的王耀南回忆说:“刘显宜的这一炮打得好,打得准。”

全民族抗战开始后,父亲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副官处长。1941年8月,日军华北方面军采取“铁壁合围”“梳篦清剿”等战法,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“扫荡”。父亲在敌机轰炸中不幸负重伤。聂荣臻司令员闻讯赶去,只见父亲“躺在弹坑里,胸前的军衣被鲜血浸透”。聂荣臻立即指示军区卫生部医疗条件和部队马上就要转移的情况,这两块弹片只能暂时留在体内。聂荣臻将自己的行军床送给了父亲,之后不久,又写信叮嘱父亲静心休养。一个月后,重伤初愈的父亲,就回到了工作岗位。在此后多年的战争岁月中,父亲一直把这张行军床带在身边。

1955年,父亲被授予少将军衔,但他的生活依然极其俭朴。因伤病的折磨,父亲几次大面积心肌梗死被送医抢救。几年后,他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。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,我们家从总后机关大院搬到了远郊的香山,住在北辛村一栋几乎全部用石头垒成的房子里。生活用水全靠院子里的那口井,门前只有一条土路,每天只有几趟顶着燃气包的小公共汽车驶过。为了给国家节省汽油,父亲从不用公车办私事。因为交通

不便,他还把女儿从条件较好的市区小学转到了香山当地的农村小学。

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因为粮食供应不足,母亲总是吃树叶和野菜,腿部出现了明显的浮肿。组织上一次又一次派人送来粮食和野黄羊,但每次都被父亲拒绝了。父亲对他们说:“我已经被工作了,还是把粮食留给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吃吧;最好送到警卫连,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在外面站岗放哨。”

北辛村北面的山沟里有一块被山洪冲出来的河滩地,因为随时可能再发洪水,所以无人耕种。经过当地生产队同意,父亲带领我们到河滩上开荒种地。河滩地里土少石多,父亲就带领我们到山上去找土,背土下山,还让我们兄弟姐妹背起筐筐到马路上去捡牛粪。我们全家人辛勤劳动,硬是让这片河滩长出了红薯和玉米。当我们全家欢欢喜喜地把粮食从河滩抬回家的时候,父亲心里惦记的却是附近的困难群众。他让母亲把堆在地上的红薯和玉米先按个头分出大小,然后先从大的那堆里拿出一份又一份给附近老乡,分完大的又分小的。当小的这堆也只剩下最后一小堆的时候,我哭了,不仅是因为我饿,还因为我看见母亲由于长时间不怎么吃粮食,腿上的浮肿已经非常严重了。

晚上父亲把我们叫到一起,给我们讲抗日战争时期“藏粮于民”的故事。他说:“那时候打游击战,部队的粮食分散隐藏在老乡家,无论饿到什么程度,无论

鬼子的手段有多么残忍,老百姓坚决一粒军粮都不动!因为他们知道,他们的希望就在这这一袋袋军粮中。”父亲感慨地说:“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为什么旧社会会被推翻,就是因为旧社会当官的脱离群众,压迫群众。”

1976年父亲因癌症住进医院。他病重的时候经常大口吐血昏迷,医生决定给他输血。可每当父亲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正在输血的时候,他都会马上把针头拔掉。父亲对医生说:“这是人民的鲜血,不要再为我浪费了,把它留给更需要需要的同志吧。”护士后来只好用报纸把输液管包起来,但父亲还是一次次发现后拔掉。1976年9月30日,父亲逝世,终年73岁。父亲的遗体火化后,司炉工人从骨灰中找到了折磨父亲整整35年的两块弹片。

父亲对孩子们的爱,全都体现在了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上。因为父亲的工作性质,他与党中央、军队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同志非常熟悉,但他从不因个人的需要找关系,谋私利。父亲说: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;要革命第一、工作第一、他人第一。

在我的记忆里,父亲唯一一次“走后门”是对我入伍后的工作安排。1969年我参军了。军列还没有开到目的地,父亲的电话就打给了东海舰队的马龙副司令员,要求他把我安排到条件最艰苦的单位去。结果我一下火车就被分配到海军工程兵海岛施工连队去打坑道。因为缺乏淡水,在坑道尽头的作业面上,风镐的钻头中吹出来的细石粉如同云雾缭绕,稍远一点儿就看不清人。施工过程中,我们必须要一次次用手指敲鼻梁两侧,才能将鼻孔中的石粉清理出来。在经历了极其艰苦的生活,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后,我刚满18岁,就光荣入党。

回忆父亲的足迹总让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我仿佛听到父亲站在“敌军围困千万重”的黄洋界上,打向敌人的隆隆炮声;仿佛看到父亲在过雪山草地时饥寒交迫又身染重病,仍一步步艰难前行的背影;仿佛触摸到父亲在日寇空袭后,躺在弹坑里浑身是血的身躯……我多么想再听一听父亲讲他过去的故事,多么想再给父亲捶一捶他日日疼痛的后背。

回想父亲走过的岁月和那些留给我们的难忘记忆,我更理解了他那句“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”。我怀念我的父亲,也衷心希望前辈们的革命精神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。

好。但因为战场的天气太冷,他落下了关节炎。阴天下雨的时候,总能看到父亲时不时揉揉膝盖和小腿。

1976年,或许是因为唐山大地震的刺激,父亲患上了焦虑症,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,嘴里一遍遍念叨着战友的名字,有时还更深半夜爬起来找活干。母亲愁得瘦了一大圈,停下手里的裁缝活,天天陪着父亲看医生,找偏方。父亲吃了一个多月的中药,才慢慢见好。

父亲73岁那年患了重病。同病魔战斗了6年后,那年国庆节前几天,他坚持要出院。国庆节那天早上,被病魔折磨得形销骨立的父亲,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当过兵的大哥,连忙打开电视,让他观看新闻里的天安门升旗仪式。父亲睁大眼睛,紧盯着电视,眼角流下了眼泪。第二天下午,父亲微笑着离开了我们。

新修的家谱中,记载着他是中国共产党员、中国民兵志愿军战士。我时常翻看家谱和手机里翻拍的父亲照片,心里想,父亲没有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,只是把信仰活成了日常。他如同一盏明灯,始终在我心里亮着。

## 情到深处

2014年12月5日一大早,妹妹从徐州老家打来电话告诉我,已90岁高龄的母亲病危。我立即购买了当天的火车票,带着儿子急急忙忙赶往火车站。

下了火车,我们坐上汽车直往家里奔。路上,电话铃声再次响起。妹妹哭着告诉我,母亲走了。顿时,我哽咽着,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。

回到家中,我仔细端详着母亲,她像睡着了一样。周围的乡亲们纷纷谈论着,说老太太宽厚仁慈、扶危济贫,晚年家庭和睦、幸福长寿。听到这些,我心里有了些许安慰。

我的母亲很普通,如同千千万万农家妇女一般,终日在家里、地里辛勤劳作。但她对儿女的热望和厚爱深深刻在我心里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正是中国经济困难的时候。我以全县最优成绩考上中学。当时,家乡因闹水灾,几乎颗粒无收,吃饭都成了大问题。直到入学报名那天,家里还筹措不出学费来。一夜间,母亲的头上就增添了许多白发。小学的几位老师听说我家的窘境,都尽力捐助了些,但依然凑不够数。母亲看着哭肿了眼的我说:“孩子,就是砸锅卖铁,娘也供你上学。”说完,母亲狠了狠心,硬是把家中唯一的那只老母鸡拿去卖了。

去学校报名那天,母亲拉住我的手说:“孩子,可要争气啊!”

等到开春,日子更苦了,还有同学退学了。一个星期六的下午,我放学回家看到房门上了锁,就去问邻村的姑姑。姑姑告诉我,母亲为了给我带上学干的干粮,出去讨饭多日了。

我一溜小跑赶回家里,只见母亲正坐在灶膛边烧火。看到我回来,母亲忙从锅里捞起一块热白薯递给我,说:“孩子,趁热吃吧!”拿着甜丝丝的白薯,我三口就吞了下去,觉得不解馋,还想吃,就一把掀开锅盖。一看,我愣住了,母亲做的竟是一锅清水煮苦菜。我鼻子一酸,就哭了,哽咽着说:“娘,我不上学了!”可话还没说完,母亲就火了。她抓起烧火棍朝我身上打去,边打边说:“你这没出息的孩子,苦一点就想退学!”说着,母亲也掉泪了。她一把搂过我,轻轻揉着我被打的地方:“孩子,疼了吧!不是娘打你,娘就怕你不争气。眼前的苦,咬咬牙就能过去。可要是不好好念书,你将来啥能耐都没有。还是那句话,砸锅卖铁,娘也供你上学。”

1968年春天,部队到我家乡来接兵。我家中唯一的男孩,母亲却替我报了名。村里不少人说:“这老太太心真硬,就这么一个男孩子,还舍得让他去当兵!”我母亲听了不以为然。我离家前,她拉着我的手嘱咐:“孩子,你到

# 母亲的热望

■邱继臣

部队可得干出个样儿来。”母亲虽然话说得硬,可我后来听人说,我走后,她默默流泪。儿子毕竟是娘的心头肉啊!

母亲的话,对我是一种无形的激励。在部队这所大学的培养教育下,我进步很快,入党、立功、提干,算是能为军队干一点事了。对此,母亲心里比吃了蜜还甜。

后来条件好了,我便想把辛劳了一辈子的母亲接来。村里不少人也劝她:“你儿子在部队有出息,你也该跟着去享点福啦!”可母亲就是不答应,她总是说:“看着孩子出息了,当娘的比什么都高兴。”我每次寄钱给她,她也总说跟着妹妹过,自己还能干点活,不缺钱。母亲在来信中说:“趁我还能劳动,就不让你分心。你能给公家多出点力,当娘的心血就算没有白费。”话语中,全是慈母的一颗心、一片情。

我的母亲太平常了,平常得像大河里的一滴水,然而正是这滴滴水珠才汇集成奔涌向前的历史长河。母亲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和惊天动地的业绩,但我用乳汁哺育了我,用心血浇灌了我,我的军功章里有她的汗水。每当我收到母亲的来信,我也为有这样的母亲而骄傲。

## 归家小记

■张军

和儿子交流时,我得知前段时间妻子带着女儿一起参加了他的家长会。我向妻子了解此事,她只是淡淡地说:“幼儿园没人接,总不能把小的单独留在家。”她说得轻描淡写,我的喉咙却发紧。我能想象那画面:在满是成人的教室里,她是如何一边抱着懵懂的女儿,一边竭力捕捉关于儿子的每个细节。

这份艰辛,却被儿子诠释成明亮的骄傲——“我爸爸守边疆!我妈妈是超人!”孩子的声音清脆响亮,我心中却满是难以言说的疼痛。我知道,她的日常不止于此。缴费、维修、陪读……每个黄昏,当她系上围裙,油烟升起时还要留意客厅的嬉闹。我问她累不累,她总笑笑:“忙起来,日子过得快。”

记得一次深夜与妻子视频,孩子们都睡了。通话结束后,她以为我已离线,便没有关摄像头。我看到屏幕里,她独自坐在台灯昏黄的光晕中,手上摩挲着我留在家里的领花,然后慢慢弯下腰,将额头深深抵在膝盖上,单薄的肩膀开始颤抖。我的安慰苍白且无力。我知道,远在千里之外的我无法替她分担这繁杂的日常。当她回头发现了我的“存在”,除了眼眶未散的微红,嘴角已扬起熟悉的弧度:“刚收拾完,有点乏了。”

儿子叫她“超人”,女儿唤她“公主”。在我心里,她只是一个因为选择了爱,而不得不变得强大的普通人。这次休假,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,我才真正明白她的不易。她用全部生活告诉孩子们:爸爸的荣誉在遥远的边关;让爸爸能够心无旁骛地驻守远方,是这个家庭的一份责任。

我们的“并肩”,未必是朝朝暮暮的相守,而是纵然山水相隔,却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,在各自的战线上,进行着同一场名为“爱与责任”的“多线作战”。

## 说句心里话

那天休假回家,我推开家门,儿子正在写作业,女儿则抱着绘本自言自语。两个小家伙抬头看见我,愣了一瞬,便欢笑着扑进我怀里。妻子谭倩倩从厨房探出身,围裙上沾着面粉,手里还握着锅铲,脸上掠过惊喜,随即化作温柔的笑:“回来了?洗手,马上吃饭。”那笑容和视频里一样,又似乎不同——少了屏幕的隔膜,多了真实的温度。

休假后的第一个清晨,我睁开蒙眬的睡眼,发现身侧空着,厨房传来细微的响动。我披衣起身,倚在厨房门边。

当时天还未亮,妻子已在厨房忙碌。只见她手腕轻翻,蛋饼在空中划出漂亮的弧线。煎蛋的间隙,她一边盯着锅里的粥,一边麻利地洗切蔬菜。那份专注,如同指挥一场静默的战斗。

这场景让我想起在高原哨所时的那些清晨视频——镜头总是晃动,画面一角闪过金黄的煎蛋、翠绿的青菜,还有她快速移动的虚影,和一句匆忙的“你先等会儿,我得送他们上学了”。通话常常不足一分钟。屏幕暗下后,我只能对着高原的旷野出神,在脑海里拼凑出那个热气腾腾却遥远的厨房。

此刻,她回头看见我,说:“发什么呆?帮我把牛奶温上。”她叫孩子们起床的声音各有不同。叫醒儿子时,她声音里有温柔的笃定;为女儿搭配衣裤时,则细致且耐心。我跟随她一起先送儿子上学,再将女儿送去幼儿园。我站在幼儿园门口,看她蹲身为女儿整理衣领——她脸上那抹笑意,足以融化所有疲惫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:从前听见的、瞥见的,不过是这日常生活里一个微小的片段。

## 家庭秀

我拔起一棵青菜  
大棚里漾开了清脆的笑  
爸爸扶着菜筐蹲下身  
连衫服上还沾着泥土的清香  
妈妈的指尖轻柔  
拂去菜叶上的露水  
爸爸说  
这满园的清脆  
是他在军营耕耘的日常  
今天与我们一同分享  
妈妈说  
有爸爸在边疆坚守  
才有我们的温暖时光  
李贝贝配文

日前,阿里军分区某部种植员、二级上士魏金业的妻儿来队探亲。图为魏金业与妻儿在温室大棚里。  
刘晓东摄

## 从上甘岭归来

■翟长付

能看出他藏着不少故事。小时候,我曾好奇地问父亲:“你打过仗吗?打死过几个敌人?”父亲沉默许久,告诉我:“我上过战场,但没有真刀真枪地和敌人较量过。”

这句话,我一直没弄明白是什么意思。一次,母亲趁阳光好,晾晒冬天的衣服。我在一大堆衣物里翻到一个小铁盒,里面装着几枚军功章和几本证件,其中一本写着他是工兵班副班长。

那天晚上,我和弟弟跟着父亲去看守生产队的猪场和瓜园。父亲在猪场拱形的水泥房顶上浇了几担水,铺上席子。我和弟弟躺在席子上,缠着父亲给我们讲打仗的故事。

父亲说,他们连队是工兵连,平时主要负责铺路修桥。上甘岭战役中,他们

连队的任务是往前线运送枪支弹药,父亲因完成任务出色立功。在那场战斗中,父亲在火线入了党,和战友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往前线送弹药,腿也被炮弹炸伤了。父亲说,他是被同班战友背下阵地的,而背他的那位战友,两天后不幸牺牲了。父亲停顿了一会儿,端起烟锅吸了口烟,低声哼唱:“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……”

腿受伤后,父亲就回国了。他在部队又待了两年多后回到地方。当年在战场上,虽说有枪有子弹,可父亲始终没机会和敌人面对面交锋。每次说起这事,父亲总遗憾地摇头:“没能亲手消灭一个敌人,还入了党、立了功,心里不踏实。”

父亲的腿伤不算太严重,恢复得很

## 两代之间

从我记事起,老屋东房门口的墙上一直挂着一个相框,相框里有一张黑白老照片,是父亲退役时拍的,到现在已有70多年了。

照片上的父亲很年轻,戴着棉军帽,军装上缝着“中国人民志愿军”字样的布制胸标,胸标上方别着两枚军功章。照片左边空白处,写着5个繁体字:上甘岭留念。

父亲很少提他在战场上的事。我们问起军功章的来历,他总是摇头:“都是过去的事,不值当说。”可从他的眼神里,我

